

北非中东变局及其影响

【编者按】2010年底起于突尼斯、2011年以来迅速扩散的北非、中东动荡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其发生的根源、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的应对也是目前我国政界、学界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东变局的深层根源是什么?骨牌效应会扩散到哪里?会不会改变中东政治力量对比甚至重塑中东战略格局?会不会影响全球战略态势?中东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战略影响如何?中国从中东变局的发生根源及其影响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于2011年3月10日举办了题为“当前北非、中东变局及其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北非中东政治变局原因初探

东方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到目前为止,从突尼斯开始的政治变革风暴已经刮走了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两位阿拉伯政治强人,使一个国家(利比亚)爆发内战,而各种类型的游行示威活动更是呈蔓延之势。就像1991年和2001年,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中东又一次陷入难以预测的政治风暴当中。

万事都有个缘由。虽然这场政治风暴还在持续,中东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但我们还是试图找一找发生这场剧变的深层原因。第一,从事件引爆者的身份找原因。中东这场政治风暴始于突尼斯街头小贩、26岁的大学毕业生默罕默德·布瓦奇奇走投无路而自焚身亡这一偶然事件。我们从这一事件中读出的信息主要有三:青年、大学毕业、城市街头小贩。据统计,中东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每个育龄妇女所生子女数目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略低。在迅猛增长的人口中,15-25岁的青少年比例非常高,大约在一半以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收入的增长,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始了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根据联合国

相关机构统计,阿拉伯国家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像开罗、阿尔及尔、利雅得、的黎波里、巴格达这样的首都,聚居的人口往往在国家总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比如,埃及人口约8000万,开罗就有1800万。同时,阿拉伯国家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人口的比率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高的,大约占22.7%,这一比例不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甚至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勾勒出这次政治变局的基本动因:当如此众多的、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拥挤在无法提供安身立命条件、畸形发展的城市里的时候,政治变动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我们从有限的资料中看到,摩洛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的失业率为45.3%,阿尔及利亚为54.2%。

第二,从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找原因。2006年底,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随后席卷了欧洲和日本。在次贷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公司和银行破产、股市急剧下挫。2009年底,迪拜债务危机爆发,随后逐渐蔓延到欧洲的冰岛、爱尔兰

兰、希腊等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在这一波危机中,人们谈论的已不只是公司倒闭、银行关门,而是国家破产问题。2010年底,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动乱开始上演,比起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承受能力更差,在这里上演的不是银行和公司倒闭,也不是国家负债过高,而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更加恶化,引爆街头政治,进而出现改朝换代和血腥的内战。我们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仔细研究这场危机的传导过程、作用机制,不过仅凭直觉我们就会发现,当漫天飞舞的美元不断飘向全球、当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如断线的风筝直飞云端时,阿拉伯国家那些最贫困的人就只能引火自焚了。

第三,从更宽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找原因。就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也是被强行拉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阿拉伯国家比别的国家和地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之中的西方化,某种被包围、被异化、被西方强迫的感觉长期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当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中国家开始分化之时,阿拉伯人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沙特因其在能源领域的巨大影响得以跻身 G20 国家之列,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不仅在全球政治中无足轻重,甚至在地区事务中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阿拉伯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落伍者、失败者,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失望、失落的情绪到处蔓延。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至少在两个方面为政治动乱准备了条件。其一,利用特权,也有的利用自己的才华,一些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了财富迅猛积累,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鸿沟变得更为广阔;其二,全球化也使得人们比从前更容易获得知识和信息,人们不仅更容易对比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别,也更容易了解身边的有钱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第四,通过政治变局的性质看原因。20世纪 50 年代,民族主义在中东广泛流行,纳塞尔领导的革命推动了整个地区变革;从 70 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带有伊斯兰特征的各种思潮和社

会、政治运动席卷整个中东地区,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对民族主义的反动;当前的这场政治变局把矛头对准盛行于这一地区的威权政治,对伊斯兰主义的各种政治选项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基本上将之定性为民主主义运动,是阿拉伯人民(或者更为宽泛地说中东地区人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意识觉醒,它试图寻找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道路。也许,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场运动不一定会带来中东地区政治民主化,甚至可能为伊斯兰主义再次高涨清除路障。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事变中,民众的抗争并没有在伊斯兰主义中寻找传统的武器,其矛头所指主要是家族、政党或个人对国家权力的长期垄断。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这场政治变局的内在逻辑:其一,50 年代民族主义革命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对内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公正性,对外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及基本尊严,而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家族或个人已成为全民公敌。其二,从 70 年代盛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种牌号的伊斯兰主义——回到先知时代的传统的“萨拉菲亚运动”、伊朗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还有更广泛的“Islam is solution”召唤——也不能为阿拉伯国家的复兴和发展提供动力和解决方案。

美国著名中东历史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说:“中东地区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危机。其中一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机,指的是由于经济损失和更麻烦的经济乱象所导致的困境及其社会后果。另一个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危机,指的是共识的崩解,这种共识乃是一套人们普遍接受的规矩和原则,政权赖之以运作,没了它,社会就无法运作。”

我深以为然。阿拉伯民众在推翻威权主义政治方面正在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却破坏了已有的“规矩和原则”。更为严峻的是,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对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形成共识,难道说阿拉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正在进入一个崩解时代? ○